

# 多元化与内卷化:大学生就业意愿变化的趋势分析(2015—2023年)

刘保中<sup>1,2</sup>, 臧小森<sup>3</sup>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与民族学院, 北京 102488;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大学生就业意愿是青年职业价值观的重要部分,是理解大学生就业选择、预测大学生就业行为的重要前提。近些年尤其是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以来,大学生就业形势面临着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的诸多新不利因素,大学生就业意愿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使用2015—2023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SCUS)数据,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新特征、新趋势、影响机制及其变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近10年大学生就业意愿总体上呈现多元化选择趋势,同时也体现出“升学内卷”和“体制内卷”的特征。宏观外部环境、大学生家庭资本和个体人力资本的差异均影响到了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分化。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变化对其顺利就业的负面影响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关键词:** 高等教育; 大学生就业意愿; 家庭资本; 个体人力资本; 内卷化

中图分类号: C91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24)05-0021-13

## 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人就业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一直以来备受社会各界的注目。放眼全球,青年因其工作经验的缺乏导致群体性就业困难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而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学历通胀”又加剧了青年大学生的就业困难。相比之下,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更加急速,自1999年我国实行大学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迅速增加,分别在2002年和2019年达到15.0%和51.6%,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快速过渡<sup>①</sup>。由于我国大学生基数较大,每年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的毕业生面临就业,大学生就业问题表现得异常突出。

收稿日期: 2024-05-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SH045);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经济社会调查项目(2024ZDDC005);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级科研项目(20220099)

作者简介: 刘保中(1983—),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教育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副教授。

① 根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研究,高等教育发展可分为“精英”(Elite)、“大众”(Mass)、“普及”(Universal)三个阶段,如果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属于“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15%~50%之间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属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本文采用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情况来自教育部发布的历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

近年来,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和经济增速的普遍减缓,大大加剧了大学生的就业困难程度,尤其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我国大学生就业面临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的诸多新不利因素,这些新形势的变化对于分析当前大学生就业的新问题与新特征具有重要影响。

从内部结构来看,大学毕业生人数呈现总量增多、增量加大的特征。目前,大学毕业生人数仍旧表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总量压力依然巨大,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人数呈现增量加大的新特点。自我国大学扩招以来,大学毕业生总量逐年增加,但每年的增量并不均衡。在首批扩招后的专科毕业生和本科毕业生分别于2002年和2003年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的最初几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增量非常明显,但从2008年开始增量呈现减少趋势,并从2010年开始长时间维持在每年新增毕业生人数均未超过30万人的态势,但是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后的2020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增量又开始加大,2020—2023年高校毕业生数量比前一年分别增加40万、35万、167万和82万,是自2010年以来增量最多的几年(详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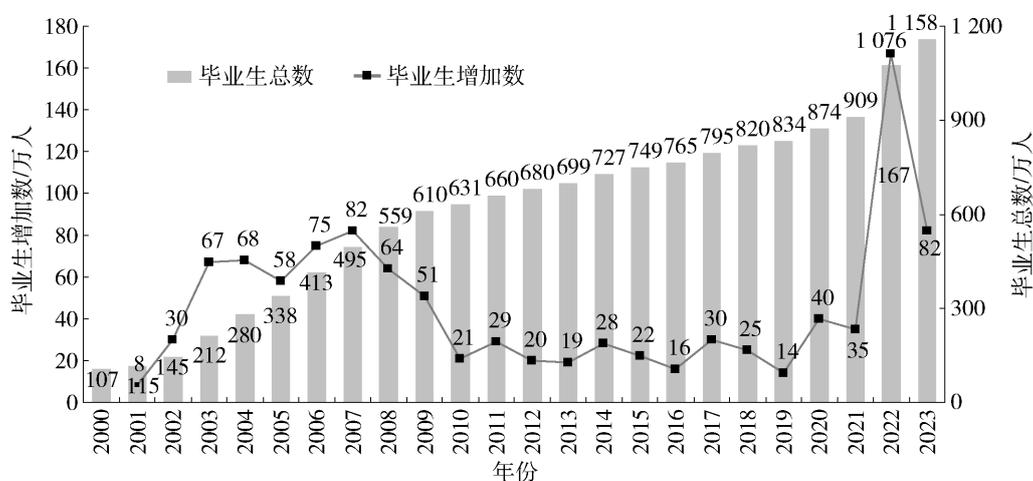


图1 2000—2023年我国大学毕业生总数和增加数

数据来源:教育部发布的历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

从外部环境来看,自202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又叠加了疫情影响、行业变动的联合冲击,极大加剧了大学生就业的困难程度。教育培训、房地产和互联网平台经济曾是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三大主要行业,但受到产业发展阶段和行业发展政策调整的影响,这三类行业发展规模在近几年出现明显的收缩和低迷,尤其是教育培训行业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

综合来看,我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之后,大学毕业生就业同时面临毕业生人数总量增多、增量加大,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疫情冲击、大学生主要就业行业大幅收缩等“内外交困”的新情况,导致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大学生就业意愿作为大学生择业就业的“风向标”,对于理解大学生就业观念、预测大学生就业行为具有重要价值,一直是大学生就业领域重要的研究主题,相关研究成果较多。随着就业形势的重要改变,大学生就业意愿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前大学生就业意愿表现出哪些新的特征?呈现怎样的新发展趋势?影响大学生就业意愿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本文将使用最新的调查数据资料,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推进该领域的研究。

## 二、文献综述

就业意愿是个体在职业选择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相对模糊的意向性需求,是就业者对其现状的认知与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期待<sup>[1]</sup>。就业意愿反映了个人的择业意向,既包括个人是否愿意就业,

也包括个人想选择什么样的就业形式、工作或者职业类型。就业意愿是职业选择的先行倾向,是个人择业的计划与期望,也反映了个人对未来职业的一种主观感受、价值评价和倾向性态度,构成了就业价值观或者职业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作为重要的就业群体,其就业意愿显示出他们对未来职业的价值评判及就业的倾向与方向,对大学生实际的就业行为与就业结果具有关键的预测作用。尤其是自20世纪末我国高校扩招以来,大学生出现“就业难”问题,关于大学生就业意愿、就业取向、择业意向、择业偏好等反映大学生就业选择态度的研究,成为我国大学生就业领域研究的重要主题。目前,国内有关大学生就业意愿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大学生就业意愿的特点、影响因素与变迁趋势。

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变化趋势研究关注不同时期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变迁趋势。该主题早期的研究主要关着眼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择业意向的变化特点。杨雄指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生择业逐渐由国家主导转向个人意愿凸显,呈现出明显的功用性转型,择业趋于理智和成熟,经济参与意识增强<sup>[2]</sup>。黄发友等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择业价值取向的变迁轨迹,认为大学生择业价值取向的变迁是经济社会变革大背景和就业制度政策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呈现出个体主动性增强、注重实惠性与现实性、功利性日趋明显等变化特征<sup>[3]</sup>。刘成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就业依次经历了被动择业的服从分配时期、走向开放的双向选择时期、追求发展的自主择业时期这样大概三个历史阶段,呈现出自主化主体性增强、务实化政治色彩淡化、多元化选择范畴宽广等特点<sup>[4]</sup>。早期大学生就业意愿变迁研究的基本共识是在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背景下,随着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调整、制度与价值层面的变革,总体上呈现出主体性、自主性、实利性、个体化、多元化等演变特征。

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上,学界近些年有关大学生就业意愿变迁趋势的研究在概念化、研究主题、研究资料、影响因素等方面进一步推进。一是概念化进一步明晰,对就业意愿、择业观念、择业意识等类似概念的理解与界定、涵括内容变得更清晰,研究主题更加丰富,并形成了可测量的变量与指标,如大学生就业单位偏好、就业地域偏好、预期收入、择业标准等。二是研究资料尤其是相关社会调查数据更加丰富,这为更好地呈现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变迁趋势提供了实证分析的基础。不过这其中多数调查数据仍旧属于截面数据,导致基于这些数据的就业意愿趋势研究存在“先天缺陷”。近10多年来,关于大学生就业意愿的纵贯调查才开始增多,并形成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闵尊涛等基于对北京某重点高校连续10年(2007—2016年)的大学生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大学生升学意愿的比例始终高于找工作意愿的比例,而倾向于国内读研的比例一直高于出国和工作的比例,此外该研究还进一步分析了大学生毕业意向的影响因素<sup>[5]</sup>。不过该研究调查样本仅局限于一所高校,在代表性上存在较大问题。李秀玫等基于对上海市大学生2015年和2020年的两次调查结果,对比分析究得出:大学生择业标准趋于理性务实;就业偏好于体制内和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就业信心在降低;不愿降低薪酬预期反映出大学生物质主义的就业价值取向<sup>[6]</sup>。该研究使用的调查数据涉及了多所学校样本,同时也跟进到了疫情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但由于调查仅涉及上海市高校,同样存在地域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刘保中使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主持实施的“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在2013—2018年期间大学生就业单位和就业地域的选择结构发生了变化:在体制内单位的选择上,选择国有企业的比例大幅度提升,在体制外单位的选择上,选择外资企业的比例出现明显下降;在就业地域选择上,虽然一线城市仍旧是大学生比较青睐的选择,但二线城市的吸引力正在逐渐增强<sup>[7]</sup>。同样基于“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的多期数据,李春玲总结分析了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四个新特征:升学意愿不断增强;体制内就业意愿高涨;离开北上广深趋势呈现分化;慢就业与新型啃老现象逐渐突显<sup>[8]</sup>。岳昌君基于2003—2021年间的10次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得出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最突出的特点是偏好经济价值

和个人价值,而社会价值一直未得到重视<sup>[9]</sup>。三是基于可操作化的测量变量及社会调查数据资料的支撑,大量研究开始深入分析影响大学生就业意愿的主要因素。总结这些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个体因素,如个人兴趣、理想、能力、人格特质等。职业选择的人格类型理论认为,职业选择与个人的人格特征密切联系,按照该理论,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受到个人兴趣、个性与能力的影响;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职业选择是要追求教育投资的价值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大学生的择业行为遵循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风险约束的基本逻辑,是一个综合职业收益和职业风险成本的抉择过程<sup>[10]</sup>。第二个层面是家庭因素,即大学生就业意愿也会受到父母职业与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社会地位等家庭因素的影响<sup>[11-12]</sup>,大学生个体的就业意愿往往是家庭化的决策,就业意愿个体化的影响因素,也多渗透着家庭的烙印,比如每个个体的人格、兴趣、观念等大都受到个人成长经历、家庭社会化的影响,再比如职业选择虽然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但选择往往受到家庭因素的制约。有研究指出相比于富裕家庭的大学生,弱势群体家庭的大学生由于缺乏更多的家庭经济支持从而更愿意选择风险相对较小的职业<sup>[10]</sup>。第三个层面是政策制度、文化观念、经济形势等宏观环境因素,有研究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制度对大学生就业部门偏好的影响,以及对就业地域的偏好、政策对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的影响<sup>[11,13-14]</sup>,行业收益差异对大学生就业行业偏好的影响<sup>[15]</sup>,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观念的影响<sup>[16-18]</sup>。从内在关联看,影响就业意愿变化的个人与家庭层面的微观机制是对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变迁、职业结构、社会结构的一种映照。

本文综合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由于缺乏长时段的纵贯调查数据,目前关于近10年来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变迁趋势研究还相对较少,已有的少数研究在数据代表性上存在较大问题<sup>[5-6]</sup>;也有少数研究使用了代表性较好的数据<sup>[7-9]</sup>。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在研究数据、概念测量和研究主题方面做出推进,使用了2015—2023年的最新数据,同时明确并细化了大学生就业意愿的测量维度,力求呈现大学生就业意愿的最新特征及变迁的丰富内容,更好地探寻大学生就业意愿的演变规律。在影响因素的设定上,本文构建了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多维解释框架,既包括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度、经济形势、特殊事件等因素的变化,也包括嵌入在宏观因素之中的微观家庭、学校和个体因素。宏观因素通过家庭、学校传导给大学生个体,对大学生就业意愿施加综合影响,使得不同背景和特征的大学生在就业意愿上进一步产生差异。

### 三、数据与方法

#### (一) 研究数据

目前,我国学界专门针对大学生的大型社会调查数据还不多,长时段的历时性调查或者追踪调查就更少。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实施的“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anel Survey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PSCUS),该调查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部承认学历的高等学校为总抽样框,采用多阶段混合抽样方法在“学校-专业-班级”三个层次的抽样单元中进行抽样。学校为初级抽样单元(PFU),按照学校类型、学科类型和分布地域的不同,划分为3个抽样层(抽样框);专业为二级抽样单元(SSU),在选中的学校里,每所学校随机抽取8个专业;班级为三级抽样单元(TSU),在入选的专业中,每个专业每个年级随机抽取1个班级。

PSCUS为年度调查,每年开展一次调查,基线调查年份为2013年,但由于2013年和2014年调查关于大学生就业意愿的题目较少,为了更好地进行对比分析,本文选取了该调查从2015—2023年共9个年度的调查数据,构成了约10万人的大样本,调查对象为各个年级的在校本科生和高职生。

#### (二) 变量说明与分析思路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大学生就业意愿进行测度:就业去向、就业单位类型、就业地域类型、慢就业

选择。一是就业去向,主要包括了参加工作、国内升学、国外学习、自主创业和不确定等五种主要的类型;二是就业单位类型,包括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自主创业、不确定等类型;三是就业地域类型,包括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二线省会城市或非省会的经济发达城市、三四线中小城市、县级市/县城、小乡镇、农村、不确定等;四是慢就业选择,反映了大学生在毕业时或毕业后短暂时间未能及时就业的情况下可能做出的选择,PSCUS通过以下问题进行测量“如果自己毕业后3个月还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您最可能会选择哪种情况”,回答包括了“只好接受不满意的工作”“先不工作,继续求学”“继续找让自己满意的工作”“创业”“不确定”等选项。

本文在分析思路,首先,针对界定的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四个方面,通过描述性统计,描绘总结2015—2023年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变化趋势及主要特征;其次,通过合并九年数据构建汇合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影响大学生就业意愿的主要因素。与描述性分析部分的因变量相比,我们在汇合回归分析部分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四个变量进行了简化处理:把就业去向处理为国内升学、国外读书和其他选择三个类别;把就业单位类型处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类别;把就业地域类型处理为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及以下两个类别;把慢就业选择处理为是否慢就业两个选项,选择先不工作继续备考升学即为慢就业,其他选择为非慢就业。对因变量的简化处理主要是基于分析目的的需要,也是为了简化模型分析。在自变量方面,本文选择了三个维度的变量:宏观环境变量、家庭资本变量、个体人力资本变量。宏观环境变量采用调查年份作为代理变量,为连续变量。家庭资本变量包括家庭相对经济水平(连续变量,由低到高分五个等级)、父母较高受教育年限(连续变量)和家庭户口(二分类变量,包括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个体人力资本变量包括大学生性别(二分类变量,包括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所属学校类型(三分类变量,包括重点大学、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英语能力(连续变量,由低到高分五个等级)、是否学生干部(二分类变量)、是否党员(二分类变量)。控制变量为学校所在城市类型(三分类变量,包括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及以下)、学生年级(三分类变量,包括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及以上)。

本文在模型选择上,根据因变量的属性,针对就业去向的分析采用了多分类Logit(Mlogit)模型,对其他三个因变量采用了二分Log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大学生个体特征数据和学校特征数据的聚类性质和嵌套结构会导致同一层次的样本不完全独立,这会导致回归估计的不准确。为了解决由同一个群(cluster)内观测个案的自相关问题,本文采用了基于学校(cluster)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析,以控制因个体数据嵌入不同学校群而产生的异方差问题。同时,采用交叉分类多层模型回归(cross-classified multilevel model regression),把学生个体视为层一,把学校视为层二。基于此方法得出的估计结果,与基于聚类稳健标准误回归得出的回归模型结果一致。

本文除了建立多因素的影响模型之外,还建立了交互模型,即分析年份变量与其它自变量的交互作用,重点考察随着时间的推进和宏观环境的变化,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是否会发生变化及发生怎样的变化。

## 四、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变化趋势

### (一) 就业去向

图2描述了2019—2023年大学生就业去向意愿的变化趋势<sup>①</sup>,我们可以发现,在多种未来就业选择中,大学生国内升学意向的比例最高,并且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的几年升学偏

<sup>①</sup> PSCUS自2019年调查开始询问大学生就业去向的意愿,因此本文只关注了该变量自2019年以来的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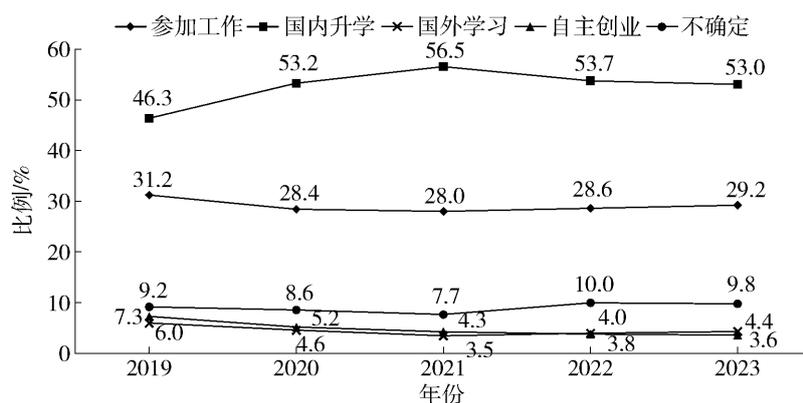


图2 2019—2023年大学生就业去向意愿的变化趋势

好表现得尤其突出,其比例均超过了50%。2020—2023年,大学生倾向于毕业后参加工作的比例均不足三成,明显低于倾向于升学的比例。多数大学生之所以把继续提升学历作为毕业去向的首选,有大学生希望通过深造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和人力资本的动机,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变化反向影响大学生就业心态的结果,就业形势的进一步严峻,以及学历通胀导致大学生不得不通过“学历内卷”来试图寻求好的就业机会。

从2019—2023年的数据看,大学生中有意去向国外深造和自主创业的占比并不高,而且在2020年后呈现下降趋势,两项选择的比例分别由2019年的6.0%和7.3%,下降到2023年的4.4%和3.6%。

## (二) 就业单位类型

本文所指的就业单位类型主要指的是就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即体制内单位和体制外单位。前者包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后者包括外资企业、私营企业、自主创业等。与体制外单位相比,体制内单位具有相对较大的就业稳定性。大学生本应是相对具有冒险精神和风险意识的群体,但是2015—2023年的数据显示大学生群体整体表现出明显的求稳就业心态。图3显示,大学生就业意愿表现出强烈的“体制内偏好”,且在近几年呈现增强趋势。2015—2023年大学生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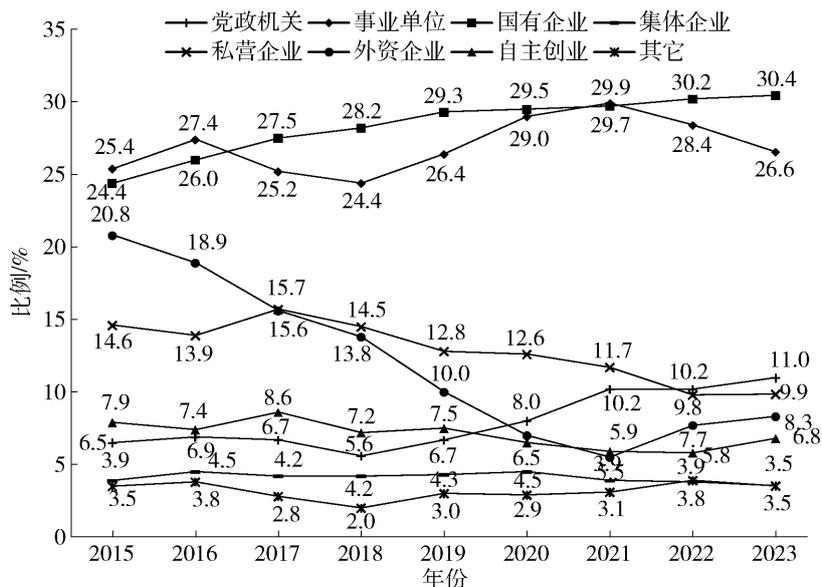


图3 2015—2023年大学生不同就业单位类型意愿的变化趋势

向于体制内单位就业意愿的比例均超过了60%,尤其是在2020年之后该比例均超过了70%。

在具体的就业单位类型的选择上,大学生选择党政机关即“考公”的比例从2015年的6.5%上升到2023年的11.0%;选择国有企业的比例从2015年的24.4%上升到2023年的30.4%;选择事业单位的比例从2015年的25.4%上升到2023年的26.6%。相比之下,大学生倾向于去体制外单位工作的比例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其中选择私营企业的比例从2015年的14.6%下降到2023年的9.9%;选择外企的比例从2015年的20.8%下降到2023年的8.3%,下降最为明显。大学生选择毕业后创业的比例虽然变化不大,但占比一直较低。

通过2015—2023年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尽管大学生在就业单位类型的选择上仍旧是多元化的,但呈现明显地向体制内单位“内卷”的趋势,普遍追求“考编上岸”。这与当前大学生就业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分不开的,毕业生人数的加速增加、经济增速的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行业的市场变动,导致就业风险和职业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大,强化了大学生追求稳定的就业观念。

### (三) 就业地域类型

从就业地点的选择来看,大学生就业意愿也呈现显著的偏好,大部分大学生倾向于选择去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工作,不过这一占比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相比之下,想去三四线中小城市、小县城、基层乡镇和农村工作的大学生占比虽然相对较少,但却呈逐年上升趋势。图4显示,2015年想去一二线城市工作的大学生占比达到81.8%,2023年则下降到70.5%;2015年大学生中想去三四线中小城市工作的比例仅为6.5%,2023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2.1%;想去县城工作的比例也由2015年的1.9%上升到2023年的5.3%。近些年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大城市好的就业机会减少,就业竞争加剧,住房成本、生活成本并未降低,导致其就业吸引力在下降。相比之下,在中小城市工作、回县城考公考编相对更容易获得安稳、舒适且体面的生活。“北上广打拼,不如小县城掘金。”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放弃北上广打拼、回县城考编。一些三四线城市、县城、乡镇和农村的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上升,城市配套也持续完善,也成为这些地方吸引大学生的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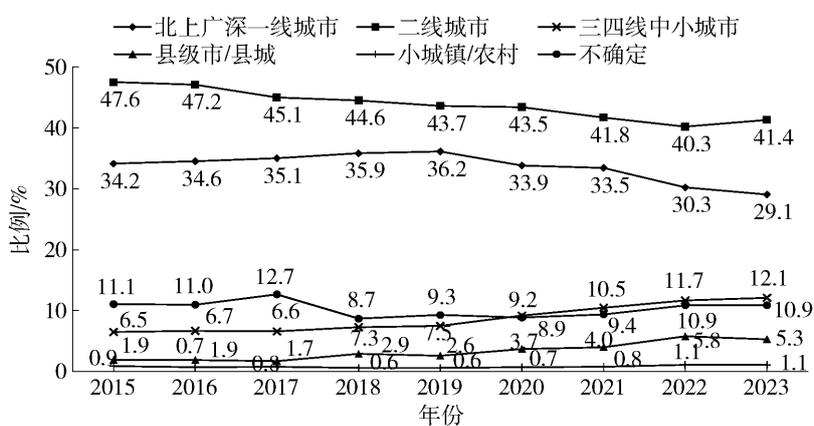


图4 2015—2023年大学生不同就业地域类型意愿的变化趋势

### (四) 慢就业选择

总体来看,如果出现毕业后仍旧未落实工作的情况,半数以上的大学生表示仍然会选择工作,要么会选择只好接受不满意的工作,要么继续找让自己满意的工作。但从变化趋势看,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大学生中倾向于选择“先不工作继续求学”的比例呈现明显增加趋势,逐渐超过选择“只好接受不满意的工作”和“继续寻找让自己满意的工作”的比例。选择“先不工作继续求学”的大学生比例从2015年的17.0%上升到2023年的29.9%,尤其是在2020年之后,在找不到满意工作的情况下,该选择已经成为大学生最倾向的就业策略。这一结果说明,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就业竞

争日渐激烈的情况下,大学生普遍选择提升学历作为应对之策,即使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多数毕业生仍然认为是值得的。大学毕业生对更高学历的追求,主要还是因为面对就业市场压力而做出的无奈但理性的决策:一方面,大学生为获得高学历而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意味着确实能够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提升自身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学历依然是劳动力市场上衡量大学毕业生能力最重要的“信号”,替代信号的缺失导致学历竞争的进一步加剧<sup>[1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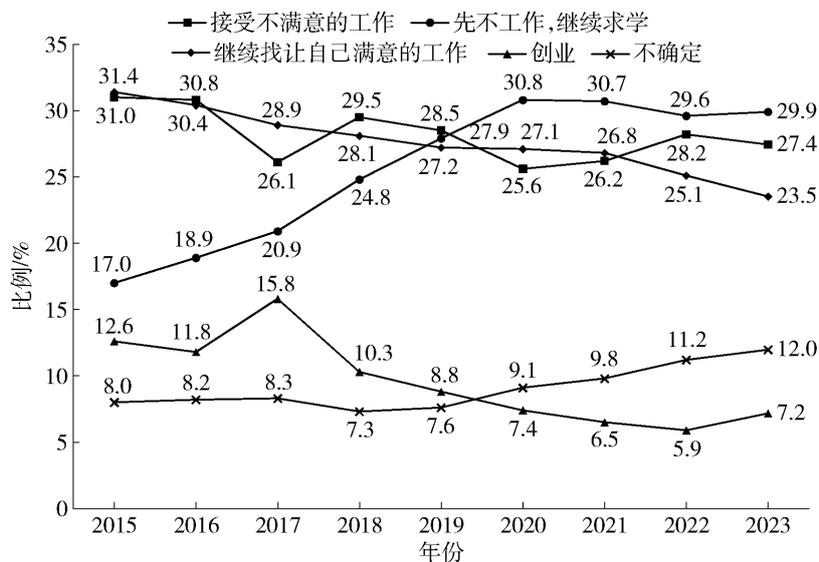


图5 2015—2023年大学生慢就业选择意愿的变化趋势

## 五、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变迁趋势

### (一) 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

本文通过描述性分析得出,迫于就业压力和就业市场的“水涨船高”,近年来大学生的升学意愿明显增强,出现了向升学内卷的趋势。

表1模型1显示了大学生就业去向意愿的多分类Logit回归结果,因变量基准组为非国内升学和出国学习的选择。可以看到,大学生选择毕业后国内读研或者专升本的可能性与年份呈正相关,出国学习的可能性则与年份呈现负相关,这印证了描述性分析的结果,即大学生国内升学热情趋高,但出国读书热情下降。在其他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上存在相似之处,一是家庭因素,通过模型结果可以看到,家庭相对经济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城市家庭的大学生更愿意选择继续升学读书而不是毕业后就参加工作,由此可以得出家庭资本的差异导致了大学生就业去向的分化。家庭相对经济水平对选择出国学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出国留学需要的经济支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财力的差异。二是个体因素,人力资本水平尤其是学业成绩更为优秀、学校层级越高的大学生,更愿意选择国内升学和出国学习。相比于男大学生,女大学生更愿意继续升学或学习。

表1模型2结果显示,年份变量的系数为正且统计显著,表明在2015—2023年间,在校大学生体制内就业意愿随时间推进逐渐增强,体现出向体制内卷的趋势。从家庭层面的影响看,家庭相对经济水平和父母较高受教育年限的系数均为负且统计显著,农村户籍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更倾向于体制内就业,这一结果表明,拥有家庭资本更少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体制内单位就业,凸显出

表1 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多维因素模型

变量	模型1 就业去向		模型2 就业单位 类型	模型3 就业地域 类型	模型4 慢就业 选择
	国内升学 VS 非升学	出国学习 VS 非升学			
年份	0.039 <sup>*</sup> (0.020)	-0.058 <sup>*</sup> (0.028)	0.112 <sup>***</sup> (0.011)	-0.095 <sup>***</sup> (0.019)	0.097 <sup>***</sup> (0.007)
家庭相对经济水平	0.003 (0.023)	0.320 <sup>***</sup> (0.054)	-0.089 <sup>***</sup> (0.019)	0.004 (0.029)	0.040 <sup>**</sup> (0.015)
父母较高受教育年限	0.053 <sup>***</sup> (0.007)	0.197 <sup>***</sup> (0.018)	-0.026 <sup>***</sup> (0.004)	0.046 <sup>***</sup> (0.008)	0.033 <sup>***</sup> (0.005)
户口(城市户口=0)	-0.208 <sup>***</sup> (0.038)	-0.537 <sup>***</sup> (0.096)	0.132 <sup>**</sup> (0.039)	-0.055 (0.065)	-0.116 <sup>***</sup> (0.031)
性别(女生=0)	-0.328 <sup>***</sup> (0.060)	-0.309 <sup>***</sup> (0.072)	-0.287 <sup>***</sup> (0.063)	0.163 <sup>***</sup> (0.044)	-0.070 (0.044)
学校类型(重点本科=0)					
普通本科	-0.272 <sup>*</sup> (0.108)	-0.381 <sup>*</sup> (0.230)	-0.023 (0.142)	-0.167 <sup>*</sup> (0.166)	-0.001 (0.098)
高职院校	-1.333 <sup>***</sup> (0.122)	-1.895 <sup>***</sup> (0.221)	-0.251 <sup>*</sup> (0.122)	-0.569 <sup>***</sup> (0.145)	-0.516 <sup>***</sup> (0.116)
英语水平	0.268 <sup>***</sup> (0.024)	0.852 <sup>***</sup> (0.052)	-0.088 <sup>*</sup> (0.040)	0.270 <sup>***</sup> (0.030)	0.171 <sup>***</sup> (0.020)
学生干部	-0.011 (0.030)	0.111 <sup>+</sup> (0.063)	0.005 (0.029)	0.200 <sup>***</sup> (0.030)	0.056 <sup>*</sup> (0.027)
党员(非党员=0)	0.473 <sup>***</sup> (0.080)	-0.085 (0.138)	0.481 <sup>***</sup> (0.056)	0.244 <sup>***</sup> (0.067)	-0.031 (0.051)
学校所在地区(一线城市=0)					
二线城市	0.142 (0.123)	-0.439 <sup>*</sup> (0.175)	0.060 (0.109)	-0.104 (0.161)	0.039 (0.088)
三线城市或以下	-0.159 (0.156)	-1.069 <sup>***</sup> (0.221)	0.722 <sup>***</sup> (0.178)	-0.704 <sup>**</sup> (0.273)	0.228 <sup>+</sup> (0.137)
年级(一年级=0)					
二年级	-0.290 <sup>***</sup> (0.045)	-0.124 <sup>+</sup> (0.075)	-0.055 <sup>*</sup> (0.021)	-0.150 <sup>***</sup> (0.034)	-0.131 <sup>***</sup> (0.021)
三年级及以上	-0.373 <sup>***</sup> (0.056)	-0.135 (0.096)	-0.038 (0.023)	-0.174 <sup>***</sup> (0.048)	-0.221 <sup>***</sup> (0.038)
常数项	-78.978 <sup>+</sup> (40.593)	109.828 <sup>+</sup> (57.105)	-225.685 <sup>***</sup> (22.903)	192.681 <sup>***</sup> (39.014)	-197.038 <sup>***</sup> (14.707)
伪R平方		15.02%	4.11%	7.62%	3.58%
样本量		65 668	99 790	109 363	103 608

注:1、括号内的数字为聚类稳健标准误;2、\*\*\*表示 $p < 0.001$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1$ 。

于家庭资本相对劣势的大学生在就业取向上相对保守的就业心态,由于缺乏“家庭兜底”,他们从事体制外工作机会的机会成本更大,因而更偏好稳定的就业状态,更不愿意面对劳动力市场上的风险。从个人层面的影响看,虽然相比于非党员大学生,党员大学生更愿意去体制内单位工作,但总体上具备更多人力资本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去体制外单位工作,例如,英语水平更好的大学生更倾向于体制外单位就业。人力资本更强的大学生意味着具备大的市场竞争能力,他们也更愿意也更有可能是去竞争体制外的高薪就业职位。体制内就业单位普遍对毕业生学历有要求,由于学历壁垒,相比于本科院校,高职院校的大学生表现出更强的体制外单位就业的倾向。

表1模型3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份与就业地域类型之间为负向关系,说明大学生在就业地域的选择上呈现出偏向三四线中小城市的趋势,而不再向一二线发达城市内卷。这也是大学生理性选择的结果。一二线城市竞争激烈,机会成本增大,向上社会流动的不确定性加大,而三四线城市的配套服务和生活质量明显提升,促使大学生更愿意选择一份小确幸。从家庭和个人维度的影响看,具备更多家庭资本和个人资本的大学生,更愿意选择去一二线城市工作,大城市生活意味着更大的住房和生活成本,这部分大学生能够获得更多的家庭经济支持和社会网络支持,意味着具有更大的市场竞争力。从个体因素来看,男大学生、重点本科大学生、学生干部、党员及英语成绩更好的大学生更愿意选择去一二线大城市工作,这部分人是个人能力相对突出或市场竞争力相对更高的大学生,个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就越多,也更有可能在在大城市的激烈竞争中取得优势。

表1模型4结果显示,在2015—2023年期间,随着年份的增长,大学生慢就业选择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如果在毕业时找不到工作,那么大学生倾向于选择先不工作继续学习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在家庭和个人因素的影响上同样体现出差异,家庭经济和父母受教育状况更好,城市家庭等具备更多家庭资本的大学生,更可能选择慢就业,这是因为这部分学生能够获得更多的家庭支持,经济压力更小,能够以更多的时间成本去获得升学机会和更好的就业机会。具备更高人力资本水平尤其是学习基础和学习成绩更好的大学生,更有可能选择慢就业,如选择“二战”(第二次考研)、“三战”(第三次考研)、考编等。

## (二)大学生就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分析

本文将通过分析年份变量与其它自变量的交互作用影响,考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宏观环境的变化,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是否会发生变化及发生怎样的变化。表2显示了家庭和个人维度的自变量与年份变量的交互作用结果,限于篇幅,表2仅呈现了统计显著的交互作用项,未呈现变量主效应和控制变量的统计结果。

总体来看,家庭和个人两个层面的部分变量都有随时间迁移而发生影响作用改变的情况。表2中模型5结果显示,年份和父母较高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是负的,说明随着年份的增加,父母教育的相对影响作用在下降。从学校类型看,高职院校的影响作用在增强。这一结果说明,随着年份的增长,家庭背景相对较弱、高职院校的大学生也都越来越普遍地追求升学,说明考研、专升本等升学选择正在成为大学生越来越一致化的选择。模型6结果显示,在就业单位类型的选择上,虽然没有看到家庭资本影响强弱的显著性变化,但个体化的影响因素呈现倾向体制内的“保守”趋势:性别和年份的交互作用为负,说明女性大学生体制内单位就业的偏好得到强化;随着年份的推进,党员的影响作用得到强化,普通本科院校的大学生表现出更强烈的体制内就业的倾向。模型7结果显示,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作用在下降和弱化,说明家庭背景好的大学生也倾向于在三四线城市就业。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高职院校的大学生越来越愿意前往三四线中小城市发展。模型8结果显示,父母教育的相对影响作用在下降,说明慢就业成为越来越多的选择,家庭背景造成的分化影响在降低。与此同时,人力资本水平更高,例如学习成绩更好的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倾向于选择慢就业。

表2 大学生就业意愿的交互作用模型

变量	模型5 是否升学	模型6 就业单位类型	模型7 就业地域类型	模型8 慢就业选择
年份×家庭相对经济水平	不显著	不显著	-0.019** (0.007)	不显著
年份×父母较高受教育年限	-0.006** (0.002)	不显著	不显著	-0.005*** (0.001)
年份×普通本科	-0.008 (0.018)	0.064*** (0.007)	0.013 (0.014)	不显著
年份×高职院校	0.109*** (0.018)	-0.003 (0.008)	-0.066*** (0.015)	不显著
年份×英语水平	不显著	0.004+ (0.003)	不显著	0.008** (0.003)
年份×党员	不显著	0.044*(0.013)	不显著	不显著
年份×性别	不显著	-0.015*(0.006)	不显著	不显著
伪R平方	15.16%	4.31%	8.00%	3.68%
样本量	65 668	99 790	109 363	103 608

注:\*\*\*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

## 六、结论与讨论

大学生就业意愿是青年职业价值观的重要部分,是理解大学生就业选择、预测大学生就业行为的重要前提。近年来,尤其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以来,大学生就业形势面临毕业生人数总量增多、增量加大等内部结构性变化,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疫情冲击、大学生主要就业行业大幅收缩等外部环境恶化的新问题,大学生就业意愿也因此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本文使用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SCUS)2015—2023年的调查数据资料,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新特征、新趋势、影响机制和其变迁进行了分析,主要研究结论有三个方面。

一是大学生就业意愿体现了与总体性社会价值观念演变相一致的发展特点,即从单一取向向多元取向转变,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其与我国经济社会多样化转型相伴而生,职业类型及选择标准的多样化取代单一化是基本的趋势。通过PSCUS近10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大学生在就业去向、就业单位类型、就业地域类型、慢就业选择上都体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在就业去向的选择上,表现为国内升学、国外留学、参加工作等多种形式;在就业单位类型的选择上,大学生的选择仍旧是多样化的,如体制内的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体制外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自主创业等;在就业地域类型的选择上,尽管北上广深和二线发达城市仍旧是大学生最主要的选择,但也呈现出偏向三四线中小城市、县城和农村的新趋势;在慢就业选择上,毕业不一定就业的观念被广泛接受,表现出大学毕业后继续备考升学、考编考公、找工作等多种形式。

二是大学生就业意愿在多元化取向向下呈现内卷化的变迁趋势。一方面是“升学内卷”。就业形势的进一步严峻和严重的学历通胀,导致大学生不得不通过“学历内卷”来试图寻求好的就业机会,突出表现在本科生越来越热衷考研、高职生越来越热衷“专升本”,在慢就业选择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先不工作继续备考升学。另一方面是“体制内卷”。毕业生人数的加速增加、经济增速的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行业的市场变动,导致就业风险和职业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大,强

化了大学生追求稳定的就业观念。

三是,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变化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引起的职业收入、职业地位和职业声望的变化,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评价和选择。本文把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变化主要归结到个体、家庭和宏观环境三个层面的影响。通过汇合回归分析发现,在宏观层面,近10年就业外部环境的变化促成了大学生就业意愿多元化和内卷化的演变趋势,随着年份的推进,大学生就业选择整体上呈现出更愿意升学、更偏好内就业单位、趋向三四线城市、倾向慢就业的保守就业心态;在微观层面,家庭资本和人力资本均具有显著影响,具有更多家庭资本的大学生,由于经济压力更小,升学意愿更加强烈,也更愿意经历市场风险选择去体制外单位就业,更能承受机会成本选择去一二线城市发展,更能接受慢就业选择。在个体人力资本方面,男大学生、学校层级较高、在校表现较好等具备更多市场竞争优势或者较多人力资本的大学生,升学意愿更强烈,更愿意去体制外就业单位和一二线发达城市工作,更愿意选择慢就业。同时,通过进一步分析年份变量与家庭和个体自变量的交互作用,我们可以发现,在就业压力之下,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就业选择、就业观念的影响呈现弱化趋势,这进一步说明大学生就业取向更加保守,青睐稳定,不管家庭背景如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更可能选择升学、体制内单位就业、三四线城市就业和慢就业。

从促进大学生顺利就业的角度看,大学生就业意愿近10年演变趋势的一些负面影响需要引起我们足够重视。首先,“升学内卷”“体制内卷”尽管是大学生理性权衡后的选择策略,但却产生了非理性的后果,带来就业选择的盲目性,这显然无助于多样化的就业。其次,对于更高学历的热衷,导致了大学生接受大学生教育的目标异化,很多大学生从进入大学伊始就开始为进一步升学一直做努力,文凭主义取代了教育本质,对学历的追求取代了能力培养的根本目标。最后,“升学内卷”本质上是为升学准备而非为工作准备,反过来会进一步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和顺利就业,助长大学生就业难。为此,有关部门和高校需要及时跟进了解大学生就业意愿和择业观念的误区,及早给予大学生正确的就业指导,引导大学生树立积极、适合的就业价值观,设定合理、多元的就业目标和职业发展路径,培养就业能力,同时拓宽更多的大学生就业渠道和新就业形式,并做好相应的就业保障服务。

#### 参考文献:

- [1] 蒋承, 罗尧. 专业硕士的就业意愿研究[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4, 12(4): 2-16, 183.
- [2] 杨雄. 九十年代大学生择业的五大现象[J]. 思想理论教育, 1994(5): 10-12, 19.
- [3] 黄发友, 陈沙麦. 当代中国大学生择业价值取向变迁的轨迹探析[J]. 思想理论教育, 2003(5): 67-70.
- [4] 刘成斌. 改革开放30年与青年就业观念的变迁[J]. 中国青年研究, 2008(1): 4-7, 16.
- [5] 闵尊涛, 陈云松, 王修晓. 大学生毕业意向的影响机制及变迁趋势基于十年历时调查数据的实证考察[J]. 社会, 2018, 38(5): 182-213.
- [6] 李秀玫, 向橄叶子, 桂勇. 在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之间——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就业态度的变化[J]. 文化纵横, 2021(1): 120-129, 159.
- [7] 刘保中. 时代变迁与就业选择: 新时代大学生就业意愿的新特征[J]. 青年探索, 2020(1): 15-24.
- [8] 李春玲. 风险与竞争加剧环境下大学生就业选择变化研究[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3, 42(5): 19-29.
- [9] 岳昌君. 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 特点, 变化与差异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5): 4-13.
- [10] 赵宏斌. 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风险与大学生择业行为[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3): 119-125.
- [11] 宋国恺, 武天, 李冬. 家庭地位、人力资本与政策对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的影响[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7(5): 71-78.

- [12] 尉建文. 父母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J]. 青年研究, 2009(2): 11-17, 94.
- [13] 赖德胜. 大学生择业取向的制度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 2003(7): 34-38.
- [14] 岳昌君, 邱文琪. 高校毕业生城际流动的特征分析[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9, 17(3): 88-104, 189-190.
- [15] 岳昌君. 大学生就业选择的行业因素分析[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4(3): 74-79.
- [16] 刘保中, 郭亚平, 敖妮花. 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疫情前后全国19所高校的调查对比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10): 110-119.
- [17] 刘成斌, 张晏郡. 向体制内卷: 疫情风险对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的影响[J]. 江汉学术, 2021, 40(4): 5-13.
- [18] 李春玲. 疫情冲击下的大学生就业: 就业压力、心理压力与就业选择变化[J]. 教育研究, 2020, 41(7): 4-16.
- [19] 刘保中, 臧小森. 转型理论视域下未就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心态与生活状态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9): 51-60, 24.

## Diversification and Involution: Trend Analysis of Changes in Employment Int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2015—2023)

LIU Baozhong<sup>1,2</sup>, ZANG Xiaosen<sup>3</sup>

(1.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Ethn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The employment int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ofessional values of young people, and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understanding their employment choices and predicting their employment behavior.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since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faced many new unfavorable factor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l structure. The employment willing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also shown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Using the data from 2015 to 2023 Panel Survey of China University Student (PSCU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trends, impact mechanisms, and changes of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willingnes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in the past decade, the employment willing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generally shown a trend of diversified choices, while also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l competition in further education" and "internal competition within the system". The differences in macro external environment, family capital, and individual human capital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ll affec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ir employment intention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hanges in the employment willing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on their successful employment needs to be given sufficient attention.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college students' willingness in employment; family capital; individual human capital; involution

(责任编辑: 刘 凡)